

# 陈独秀生平思想的四个转变

刘 放

**〔内容提要〕** 陈独秀生平思想经历了四次转变：从1879—1915年，经历了由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民主派的两个思想转变；1920年前后，完成了由革命民主派前进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1929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蜕变为托派。此后，始终都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在一九一五年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就以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崛起于思想界，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革命活动的开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期的一些关键时刻，犯了严重错误，而到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自此以后，他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批评教育，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陈独秀从一个封建士大夫，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前进为马克思主义者，到蜕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走上反马克思主义和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晚年虽然没有再从事托派组织活动，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他是怎样走过这条道路的呢？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1〕</sup>分析陈独秀这个人物也必须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特点联系起来。陈独秀从出生到死（1879—1942年）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国内外风云翻滚的大动荡年代。1879—1915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古老中国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空前尖锐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分化；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更加急切地求索救国的方案，原来处在封建牢笼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陈独秀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在这期间，他经历了由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民主派的两个转变。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习儒业十二世”，<sup>〔2〕</sup>拥有田地八百多亩，并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拥有商号或股权的封建官僚家庭。家庭成员中对他思想影响较大的是他的祖父、继父（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母亲和哥哥。他的祖父当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的幕僚，后“以盐提举銜候补知县”，虽无实缺，却一贯是封建秩序的卫道士。继父是举人出身，官由知县至四品道员。陈独秀在这个家庭里，从小受着封建思想的教育。少年陈独秀是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浸润下成长的。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更彻底地暴露了满清封建统治的昏庸腐朽，也鞭策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奋起寻求真理，救国图存。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甲午那年成立兴中会，加紧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展开了立宪维新的宣传活动。他们办的《时务报》影响较大。陈独秀也开始受到影响，他在甲午战争时，仍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天天只是“读书”、“吃饭”、“睡觉”，追求“功名”，“那知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sup>〔3〕</sup>的人。因此，他起初听到甲午战败的消息，还是无动于衷，“仍在梦中”<sup>〔4〕</sup>，他于1896年参加清政府的院试，考中了秀才第一名，从此挤进了封建士大夫的行列。不久，康梁变法的言论，打开了他的“茅塞”，使他受到启蒙，促进了他从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转变。

1897年夏天，陈独秀赴南京乡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却对帝国主义的罪恶和封建统治的腐败有了初步的但却是亲身真切的了解，并以此与《时务报》的主张相印证，从而产生了社会改良的迫切感，引起了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他看到了想象中“繁华美丽”的南京城，在甲午战败后却是一片荒凉；看到了由于甲午战败付了巨额赔款，物价已日见高涨，人们已经叫苦；他看到了考场的凌乱丑恶；他看到了满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正人君子，竟然高扯“奉旨江南乡试”的黄布大旗，乘机走私贩毒，大发横财，甚至打架、嫖妓、盗窃。因此使陈独秀“联想到这班动物（指考生）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重大动机。”<sup>〔5〕</sup>自始后，他成了康梁的热情追随者，越出个人和家庭的小圈子，投身爱国运动，跨出了他人生历程中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他在乡试落第后，即到杭州求是学堂攻读“西学”，并在那里参加爱国维新的宣传活动。尽管一开始就受到当地反动政府的追捕，但并没有影响他对清王朝的信念。

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被镇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些历史事件进一步教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时的陈独秀虽然没有放弃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了的“维新”之路，但仍然能够坚持爱国立场，加强同革命派的联系，表现出初步的革命倾向。1898—1900年，他在东北机会目睹沙俄侵略军残杀、掠夺、淫虐的种种暴行，更加激发起爱国御侮的志气。他回南方以后，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爱国运动。1901年到日本留学，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先后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励志社”和“中国青年会”；1902年回国，在安庆与杨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发表爱国演说，因清政府追缉再次逃亡日本；1903年又在东京参加留学生拒俄义勇队，并曾与邹容、张继等五人怒剪清朝“南洋学监”的辫子而被迫回国；一回到安庆又紧张地开展活动，集会演说，倡建“安徽救国会”。此时，随着全国拒俄运动的开展，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也日趋激烈，上海的革命者以邹容的《革命军》为始的革命宣传已震动社会。但陈独秀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和他主持制订的《安徽爱国会拟章》中，仍然没有逾越康梁改良派的基调，仍是强调所谓“守国家秩序”，“顾国体”，戒“诋毁”，主张“徐图建设”等等。陈独秀这时的认识和实践，还没有突破改良派忠君保皇的框框。

推动陈独秀由改良派向革命民主派转变的，是由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激起了我国延续五年的群众性的拒俄运动。这是一次比戊戌政变和《辛丑条约》签订更有力地推动爱国知识分子觉醒的重大事件。陈独秀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尽忠报国”的热忱，慷慨悲歌要求奔

赴抗俄最前线（甚至还有表示愿意隶属袁世凯“麾下”听从指挥的错误上书）。可是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却强加“名为抗俄，实则革命”的罪名进行残酷的镇压，因而驱使大批的改良主义者放弃对清王朝的幻想，转而走上革命道路。在“《苏报》案”发生和拒俄运动遭受镇压之后，陈独秀因组织安徽救国会清政府再次下令追捕，他并不屈服，又潜往上海继续活动，参加《国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到此，他不再盲目崇拜康梁，感到忠君保皇救国这条路走不通了。他在1903年8月17日《国民日报》上发表的七律《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表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一个英勇的（爱国）志士，不理是“保皇”还是“倒皇”了。

拒俄爱国运动受到清王朝的镇压后，由轰轰烈烈转入深入集结力量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各种报刊、各地革命团体不断涌现。1904年春至1905年夏，陈独秀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共出版23期，不仅亲自担任编辑和发行的主要工作，还亲自撰写文章达50多篇；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思想上坚持民主，反对专制；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如他在1904年6月该报第5期发表的《说国家》一文，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资产阶级的国家观，阐述了自己的民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朕即国家”的传统皇权观念，也反对了康梁顽固的“保皇”主张。他在《安徽俗话报》第12—15期连载（未完）小说《黑天国》中，无情的鞭挞了狞恶的“君主专制”，热情地讴歌了“反对朝廷”的革命英雄，发出了“世界之中，唯自由万岁”的呐喊。他在该报第19期发表的《亡国篇》第三章，论证“万般由命不由人”的荒唐，矛头直戳“真命天子”、“奉天承运”的骗局。他启发大家，要相信人定胜天，无论什么事，都要“尽人力振作自强”。这些文章阐发的思想表明，陈独秀已经与改良主义保皇派分道扬镳，革命民主主义成了他的思想的主流。

陈独秀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的同时，又在充满革命精神的安徽公学兼教员，与何摩施、李光炯、刘光汉、杨文蔚等革命者经常纵谈革命大事，这对他的思想向革命民主派迅速发展是有影响的。1905年秋，继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先后成立，他与杨文蔚等在芜湖集结革命志士，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反清革命宗旨十分明确，他担任总会会长，标志着陈独秀在组织上已成为革命民主派。当时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有其明确的界限，孙中山说得很明白：“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sup>〔6〕</sup>但这以后，他的革命活动并不多，是陈独秀爱国革命活动的一个低潮，其原因，除了客观上革命运动处境困难之外，他的积极性不高，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性和冷热病在他身上的反映。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胜利，给陈独秀以巨大的鼓舞。1912年，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接着坚决参加反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镇压安徽革命力量，对陈独秀抄家、逮捕（经友人营救释放）、还要将他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斩草除根。陈父子不得不外逃避难到上海。此时，他的思想又一度陷于痛苦、悲观与彷徨。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寓意凄凉的诗文、感伤自己“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现在是“寒影脊人瘦，孤云共往返”。<sup>〔7〕</sup>1914年11月，陈独秀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是其思想状况的集中表现。他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屑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sup>〔8〕</sup>但他在痛苦中并

没有改变爱国革命的立场，在彷徨中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求索。他也逐渐觉察到悲观消极是不对的，他决心以“笔底寒潮撼星斗”<sup>〔9〕</sup>的气概，“用利刃斩铁，快刀理麻”的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铲除社会上的一切“陈腐朽败”<sup>〔10〕</sup>，为真共和的实现扫除障碍。终于，在1915年9月，正当袁世凯祭天祀孔，开“筹安会”复辟帝制的丑剧紧锣密鼓的时刻，陈独秀挺身而出，创办《青年杂志》，更高地举起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战斗，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11〕</sup>他为了贯彻文学革命的主张，“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sup>〔12〕</sup>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 二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鼓舞和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去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发生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崭新阶段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陈独秀积极参与和领导了这次爱国运动，他与李大钊等进步思想界领袖，长期以来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这些思想和文化阵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思想。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号角式檄文，对群众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6月11日，他因亲自到北京街头散发传单而被捕。陈独秀的被捕，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在舆论和群众压力下，被迫于9月16日将他释放，他由此而获得更大的声誉。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称他是“思想界的明星”。<sup>〔15〕</sup>李大钊在欢迎他出狱的诗中，称他是“真理”和“光明”。<sup>〔16〕</sup>他被人们广泛推崇为指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前途的新曙光；从五四运动初步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两个伟大历史事件是促使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国家与革命》等，1920年以后，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使陈独秀能阅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是他能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提。

从陈独秀在1920年前后发表的大批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他自我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19年12月，他发表的《〈新青年〉宣言》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按：指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sup>〔17〕</sup>他在致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信中，明确指出“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表示不同意罗素宣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sup>〔18〕</sup>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sup>〔19〕</sup>他在《马克思学说》一

文中写道：“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陈独秀认识到，由于生产劳动者受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20〕

同时，他已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道路。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有一种“新派”人物，“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按指政治、法律和国家），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21〕他认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22〕“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23〕他在《答费哲民书》中鲜明指出：“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24〕他还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制复兴也必不免”。〔25〕

我们还从大量的材料中看到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宣传，已付诸中国革命的实践。陈独秀在初步接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参加了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大论战。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是主将，他从旁援应；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他和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并肩作战；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他是主将。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影响了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毛泽东在谈到陈独秀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起的作用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6〕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董必武、林伯渠等在谈到他们思想转变时，都提到过陈独秀的影响。

陈独秀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阐明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政党，并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明确提出：“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按指有产阶级的），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27〕“要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按指共产主义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8〕他在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共同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29〕

以上事实说明陈独秀的思想已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并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0年到1921年党成立时期，陈独秀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和李大钊等较早接受马

克思主义的同志，从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陈独秀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来华代表维经斯基取得了联系。在其帮助下，陈独秀于这年8月，首先在上海和李达、李汉俊等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以后，他又在组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李大钊联系，请李大钊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与湖南的毛泽东联系，由毛泽东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他写信给山东共产主义者，希望他们组织起来的同时，由李大钊派人帮助建立起来的；他到广东与谭平山等重新改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党诞生前夕的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说，明确指出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要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坏样子，而要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师。党的一大召开时，他写了四点建议的亲笔信，由陈公博带给大会，内容是：征求党员，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意纪律，目前的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准备。这四条建议符合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为大会所采纳。在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情况下，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这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党的幼稚，而主要是从《新青年》的创办到党的创立，陈独秀一直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在社会上是位很有影响和声望的民主主义宣传家；五四运动以后，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李大钊一起并称为“南陈北李”；他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创建人，由“一大”到“五大”，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众望所归、历史的必然。虽然陈独秀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在党的启蒙运动时是有功劳的，其功不可磨灭”。〔30〕

但是，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中仍存在不少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时就有看不起人民群众的观点，他认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更失去了理性”。并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的运动。而“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那也是“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的运动。〔31〕他在大革命兴起的1923年先后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农民问题》、《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文章中，更暴露了他轻视农民群众，低估工人阶级力量和夸大资产阶级力量的严重错误，得出了一个国民革命的错误公式，即国民党应该“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32〕在阶级关系上，陈独秀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在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关系的新变化，把资产阶级看成革命的主体和领导者，却把无产阶级看成是给资产阶级抬轿子的。这就是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理论基础。

### 三

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受到严肃的批评。经过这次会议的改选，他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领导职务。其后，陈独秀不仅没有接受党的批评，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对中国革命悲视失望，他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已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党无需再进行民主革命，而应该在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进行和平合法活动。他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参加以极“左”立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因而在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

陈独秀从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托派，被开除出党，有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也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的观察和分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表现为消极和不满，又因党的“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继续遭受损失而对革命更加悲观、失望。党内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责难，也使陈独秀在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包袱，陷于彷徨、苦闷之中。他在《答国际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到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在这一年内，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还没有形成系统。他对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愤慨并没有提出过异议，他也还没有绝对地反对党的以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视武装斗争为“盲动”。“六大”前夕，他还“预料”过“第六次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然的盲动错误”，并且拒绝了张国焘拉他另组一个“工农党”的企图<sup>[33]</sup>，他赞成举行广州起义，但不同意采用“苏维埃政府”等口号，他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

从1929年5月起，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正当陈独秀在苦闷中探求大革命失败的“真实教训”和寻找“新的出路”之际，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传到了中国。托洛茨基的著作，通过中国托派小组的某些成员，传给了陈独秀。他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和鼓舞。从这时起，陈独秀的个人“反省”期结束了。他以及和他“意见相同的人”，经过约两个月的思考和讨论，就基本上接受了托派观点，同托派结合起来。首先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与责任的问题上，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发生了共鸣。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sup>[34]</sup>进而“探本溯源”，明确说根本错误在使中共党加入国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而决定这一错误政策的是共产国际，因此共产国际必须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陈独秀说：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如不追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及责任，便是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便会“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sup>[35]</sup>陈独秀的这一说法是出自托洛茨基：“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sup>[36]</sup>他极力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宣称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所在”。<sup>[37]</sup>于是，陈独秀“大彻大悟”，迈出了转向托派的第一步。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方针策略这两个关系中国革命方向、道路和前途的极为现实的问题上，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两篇为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著作中，找到了“新的出路”。他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流氓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派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

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38〕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的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1929年8月13日，中央专门发出了《第四十四号通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其不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派）所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39〕于是，他在9月份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自行组织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

陈独秀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走了反马克思主义、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党中央还是努力挽救他，于10月6日向他发出“书面警告”。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他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10月15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作最后警告，要他悬崖勒马。但是，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竟然在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公开打出了“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宣称“你们说我们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正需要反对派！”〔40〕就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于12月10日，陈独秀就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要党员“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和国际的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12月15日，由刘仁静起草、陈独秀修改后，八十一人签名发表的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号召党员“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在斯大林领导下不革命了，中共更不革命了，要继续革命，就必须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指导下，组织一个新的政党来完成。”〔41〕

陈独秀在被开除出党前后，一再拒绝党对他的争取和挽救，并且公然进行非法的、分裂党的组织派别活动。这样，就使他同党的矛盾由思想认识走向不可调和的对抗。1929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虽然从党这方面来说，在批评他的错误的时候，有上纲过高以及个别问题（中东路问题）批错了的缺点，甚至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即使陈独秀走得那样远，是否必须要采取开除他出党的组织措施，也是可以探讨的。但是陈独秀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了中国实际；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第四国际）——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贯打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号、始终只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事实；当时他和党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争论的是非是改变不了的。陈独秀在开除出党以前一段时间中，提出一套取消主义和托派理论，在政治上反对党的“六大”路线；进行托派小组织活动，在组织上分裂党且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坚决不改正错误。陈独秀坚持自己与党对立的政治立场和破坏党的组织的活动，这当然是党纪所不能宽容的，当时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是正确的。

1929年，陈独秀高喊过“中国需要托洛茨基反对派！”1931年3月，陈独秀作为中国托派小组织人数最多的“无产者社”的首脑，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进行几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工

作。5月1日，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派，同以梁干实为首的“我们的话”派，以刘仁静为首“十月社”派，以赵济、王平一为首的“战斗社”派，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或“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次会议决定统一的托派中央机构，选举陈独秀、彭述之、陈亦谋、区芳、王文元、宋逢春、罗汉等为委员，陈独秀为书记，并出版刊物《火花》。到这时，陈独秀进一步成了中国各托派组织的总首脑，设立了华北区委、华南区委、上海沪西区委和沪东区委、济南区委，在河南、福建等地也建立了他们的基层组织。

当时，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力图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当前任务，并不是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而是应当坐待将来不知哪一天才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否定我党在农村中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断定这样做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是只能遭到失败的。他是何等的自以为是啊！十年后，同一个陈独秀却哀叹道：“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42〕这一段自白，是他对自己转向托派这一历史是非的总结。

陈云同志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文中指出：“他搞过取消派反对我们，老百姓不拥护他。陈独秀是不是以前的陈独秀呢？后来的陈独秀和大革命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人，前后都是陈独秀，以前拥护他做领袖，以后大家都不理他了”。〔43〕这是历史给陈独秀做的结论。

#### 四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以前，他曾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这是人所共知的，1937年8月出狱后他是否还是托派呢？他出狱后的一些言论和行动，表面上的确表示得很“革命”，似乎他要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了，如他出狱后不回上海参加“临委”；托洛茨基要他去美国，没有去；他的好友、同乡胡适拉他去美国，他不为所动，后又劝他参加国防议会，他又拒绝；张国焘叛党后，要陈再组织一个伪字号的共产党，他不予理睬；蒋介石派朱家骅找陈，要其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他坚决不干；蒋又派人劝陈当劳动部长，他断然拒绝，并斥蒋是“异想天开”，还说他与蒋“不共戴天”；高语罕见了一下蒋介石，陈骂他是“无耻之尤”。就连谭平山要他组织第三党，他也无意于此。他又派罗汉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表示他要去延安，他本人也与党的领导人接触。这些都是事实。但从许多材料看到另一重要的事实是陈独秀在狱中一直没有中断过和托派的联系；而出狱时，托派组织已处瘫痪状态，陈独秀与“临委”中的彭述之、刘仁静一伙原有矛盾，想恢复它一时尚无能为力，且托派仍在那里大叫反共，反战（抗战），不得人心。他是想等待合适时机，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44〕

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由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出来，9月12日到武汉，在此滞留至1938年6月。在他出狱之际，正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号召，主张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团体和个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之时。陈独秀出狱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行动，便是向博古、叶剑英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5〕放弃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主张。他认为“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

事”。〔46〕对此，延安《解放》周刊曾发表文章表示欢迎，认为陈独秀这一观点“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47〕我党对他再次作了争取、团结和挽救的工作。对他要求回延安之事，党采取了有原则的正确态度。应陈独秀之邀，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等同志曾代表党与他多次谈话，“规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成见，承认错误，回党工作，一致抗日”。〔48〕同时向他提出回延安必须履行的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并强调以“必须坚决反对托派理论和行动，作为先于一切的条件。”〔49〕

但是，陈独秀赞成统一战线，目的是要参加统一战线，使他经过五年秘密活动和监牢生活后，能公开地回到政治舞台，并以“在野”的合法身分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愿与托派一道继续处于秘密状态。他的拥护统一战线，并不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而是有他自己的统战政策的，陈独秀认为，“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50〕。这与中国托派某些骨干分子对抗日战争性质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如郑超麟等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抗战就不可能是进步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天皇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反动的”〔51〕。他们还认为，抗日战争自始就是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照搬列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主张民族失败主义，“不赞成‘拥护抗战’的说法”〔52〕。陈独秀曾斥责郑超麟等“把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头不对马咀”。〔53〕陈独秀是不赞同托派在抗战中争取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在陈独秀制定的“抗战纲领”中，第一条便是：“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54〕。他是力争把抗战的胜利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胜利，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陈独秀提出“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55〕在此基础上应允许不同党派存在，他还为统一战线规定了内部关系准则，“（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56〕他提议效法西方各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57〕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拥护统一战线的行动是背离托派原则的；与国民党的统战政策不相同，和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也不一样。陈独秀的抗战建国，是要借抗战之机，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的政治目的，与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为人民胜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与国民党继续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意图也是不相容的；与托派集团要在抗战中争取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点，同样是不相容的。陈独秀在抗战中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尽管与中国托派的政见不同，但其政治理论基础仍然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反省探索了许久，从托洛茨基那里找到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

产阶级只有待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革命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表述，是他在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理论基础的继续发展。

陈独秀对自己是很自信的，他曾对傅斯年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国人，日本人将来也要靠我们得救”。〔58〕他企图靠自己旧时的声望独立地开创一个局面，他力图在抗战阵营中能独树一帜。由于这样，陈独秀对党提出的要求回答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悔改之事确难从命。”〔59〕还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60〕事实上，陈独秀一面与党联系回延安，向党表示“回党工作固我所愿”；一面到武汉后又多次写信给已回安庆的托派人物濮清泉，要他速来武汉，共谋“复兴托派事业”。〔61〕根据濮清泉回忆说：“我到了武汉，才知道他想重整旗鼓，另起炉灶，复兴托派事业”。〔62〕陈独秀叫濮清泉立即到开封去找罗章龙，“遭罗婉言谢绝，陈很失望。”当时“一般托派，人人奔命，个个逃亡，陈独秀无力把他们纠合起来，听命于他。于是，他不要什么群众，自己单枪匹马干下去”。〔63〕1938年3月17日，他在给《新华日报》的信中竟这样说：“事实胜于雄辩，我认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我不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昧良心的勾当”。并污蔑我党“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至此，陈独秀完全露出了自己仍是托派的真面目。

陈独秀在1932年10月——1937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期间，没有投降和屈服于国民党政府。他出狱后，没有象张国焘一样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做特务，“四人帮”胡说投降国民党当特务是完全违反事实的；他也没有象曾经一时追随过马克思主义，后来叛变投敌的陈公博、周佛海一样，充当汉奸卖国贼。康生于1938年11月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给陈独秀加上“日寇汉奸，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贴”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陈独秀仍不失为是一个爱国者。他在抗战中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抗日主张，如抗日必须立足于国内，不能寄幻想于国际干涉，只有依靠自己；国民党政府必须放弃片面抗战政策，实行全民抗战；他还提出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具体措施，中心是改良政治，要求政治民主等。但是，由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始终不愿表示公开反对托派的理论与实践；陈独秀拒绝了党的最后争取和挽救，对他的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并没有认识和悔悟。

由于多种原因，尽管他在后期与托派无组织联系，但思想上“尚未达到与托派根本分歧。”甚至在维护托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怀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地步。在他临死前的1941年1月在《给S和H的信》中承认自己是一个“终身反对派”。〔64〕在思想上，陈独秀从出狱到去世，的确仍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托派分子。

## 五

陈独秀在1939年以后，眼看国民党正面战场一再溃败，又完全无视我党在广大的敌人后方领导的抗日力量，且把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看作是妨碍国民党政府抗战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应有的行动，加以攻击反对。污蔑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的全

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伶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65〕因而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日益消极和悲观。他在1942年断言：“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国家，这样时代已经过去。”〔66〕他对世界前途，同样抱有一种悲观看法。他认为反法西斯战争能否胜利很成问题，他推断大战结果，“自然建德、日古优势。”〔67〕由此，他认为“将来法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68〕陈独秀发表这些看法，是在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在英勇奋斗中发展，取得胜利条件日见增加，光明前途逐渐显现的时候。可是，他这时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远离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他的政治认识与现实生活，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十分隔膜，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晚年住在偏僻的四川江津，很少与人往来，靠朋友一些周济和稿费为生，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小学识字教本》、《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禹治九河考》等）。在纯粹学术领域作了一定的努力。其间，虽然也发表过一些政论文章，但给人们的印象已经十分淡漠。他既然离远了人民，人民也理所当然地远离了他。陈独秀在孤寂、凄凉、穷困、绝望的境况中度过了晚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陈独秀一生在经历四个思想转变过程中，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转而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虽然脱离了托派组织，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由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革命领袖，转向后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和落伍者。陈独秀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他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过程。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前进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下，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和一个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风暴中的蜕变过程。

恩格斯是这样教导人们去分析一个历史人物的。他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倾向的代表，因而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69〕陈独秀一生思想的四个转变，正是他所处时代历史潮流的反映。

怎样评价陈独秀的一生呢？毛泽东的基本论断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假过做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70〕至今看来这个论断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对于他同他的战友们当年在旧中国，冲破黑暗竖起的民主和科学那两面光辉夺目的旗帜，回顾他在五四爱国运动后和李大钊等大力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披

荆新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回顾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大革命风暴兴起时，同许多党的领导人一道作出的积极贡献，还从他犯过严重错误、失足的地方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这些作为历史的财富继承下来，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干部、培养世界观仍处在形成时期的青年学生，成长为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应该说是会有所裨益，有现实意义的。

## 注 释

- [1] 《列宁选集》第二卷，（1965年人民出版社）第440页
- [2] 《义门陈氏家谱》
- [3] 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3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 [4][5] 《实庵自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59、563页
- [6]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3页
- [7] 陈独秀：《咏鹤》，《甲寅杂志》第一卷3号
- [8]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编）《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第13页
- [9] 陈独秀：《夜雨狂歌答沈二》，《甲寅杂志》第一卷7号
- [10]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号（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第1—2页）
- [11]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1号（同[10]第60页）
- [12] 《独秀文存》卷一，第450页（同[10]第29页）
- [15] 《湘江评论》创刊号
- [16] 李大钊：《欢迎陈独秀出狱》载于《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85—86页
- [17] 陈独秀：《〈新青年〉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7页
- [18] 陈独秀：《致罗素、张轩苏的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2页
- [19]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2页
- [20] 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页
- [21] 陈独秀：《读政治》，《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7页
- [22] 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0页
- [23][25] 陈独秀：《读政治》，《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页
- [24] 陈独秀：《答费哲民》，《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页
- [26]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2—133页
- [27] 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35页
- [28] 陈独秀：《答黄凌霜》，《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99页
- [29] 《中国共产党宣言》，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 [30] 《1953年毛主席外出视察和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见1980年第二期《近代史研究》
- [31] 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九卷4号（同[10]第288、295页）
- [32]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第41—40页
- [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5页
- [34] 陈独秀：《1929年9月5日给中共中央信》，《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第57页
- [35][39] 陈独秀《1929年10月10日给中共中央信》
- [36]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 (37)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
- (38)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54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8页
- (40) 陈独秀〈1929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信〉
- (41)(61)(62)(6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 (42)(44)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第104页
- (43) 〈陈云文选〉第217页（1984年人民出版社）
- (45)(49)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9日）
- (46)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0页
- (47)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解放〉第24期
- (48)(59) 濮清泉：〈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
- (50)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40、541页
- (51) 见彭述之1974年4月为〈托洛茨基论中国〉所作序言
- (52) 〈双山回忆录〉第254页
- (53) 陈独秀：〈给陈其昌的信〉，〈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第83页
- (54) 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78页
- (55)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2—593页
- (56)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0—591页
- (57) 陈独秀：〈怎样才能够发动群众〉，〈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70页
- (58)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9页
- (60)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第1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64) 〈给S和H的信〉，〈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第119页
- (65) 陈独秀：陈独秀：〈论游击队〉同上引资料第101页
- (66)(67)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同(40)引资料第127页、第124页
- (89)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同(40)引资料第131页
- (69) 恩格斯：〈致裴·拉萨尔信〉，（1966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3—344页
- (70)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